

《東華漢學》第 36 期；205-242 頁
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華文文學系
2022 年 12 月

城市之餘：
論劉克襄《野狗之丘》、《虎地貓》的
地理空間與生命關懷*

陳木青**

【摘要】

在劉克襄的《野狗之丘》及《虎地貓》中，主要以臺北的野狗、香港的街貓為對象，觀察牠們的生態活動和行為習性。然而，牠們雖是不同物種，卻因為同是遭到遺棄，於是有著共同的身分——城市的廢棄物，宛如追求發展下的多餘，並被認為會破壞秩序及景觀而被迫驅離，甚至遭受捕捉與撲殺。

實際上，「餘」的字義並非只有多出之意，而是也有殘剩跟無盡等意涵，端看語境脈絡而定，具有多重的詮釋可能。本文欲以此概念切入，探討二書中的地理空間及生命型態，了解動物的生存實與景觀變遷、人類行為相關。就前者而言，書中的野狗、街貓大多在城市的邊緣餘部求生，以期獲得一絲生機；不過，當為了追求發展導致環境劇烈變動之時，

* 本文承蒙匿名審查委員惠賜批評與建議，以及胡舜傳先生、楊又儒先生的討論、啟迪，使論文得以更為完善，筆者亦獲益良多，特此致謝。

**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後研究員

牠們的生存餘地便也常被剝奪。以後者來說，作者在字裡行間不時流露對動物依賴人類成性的擔憂，認為此會造成主體性喪失，有失能甚至死亡的危機；但是，牠們並非只能被動承受，而是具有能動性，以開創生命的嶄新可能，而這也是劉克襄的書寫動機，希望能藉此省察人類與動物之間的倫理、互動關係，並提升對動物的尊重與保護。

關鍵詞：劉克襄、《野狗之丘》、《虎地貓》、餘、城市

一、前言：「餘」與動物

劉克襄是臺灣自然書寫中重要的創作者，動物題材常是其關注焦點，曾出版《風鳥皮諾查》、《座頭鯨赫連麼麼》、《野狗之丘》、《永遠的信天翁》、《虎地貓》等書籍，呈現其對動物行為、習性以及與人類互動的想像和觀察。¹然而，這些關乎動物的作品所描寫之物種雖各不相同，但《野狗之丘》與《虎地貓》實有可供相互參照之處。二書體裁近似且複合，皆由紀錄書寫、行為攝影與繪圖作品等多元創作組構而成；不過，此種創作型態卻也似乎造成文類難以區分、辨明，如作者在《野狗之丘》後記便提及本書「如此文圖並列，當視為何種文體，自己著實不知如何拿捏」，²卻又論及「十有八九的內容，按照事實的發展鋪陳」，使得紀實與虛構的界線有所互涉而非涇渭分明。李育霖論及《野狗之丘》時，亦述及此書雖以虛構方式呈現，卻也是在日常觀察筆記之基礎上撰就，於是定位便顯游移、曖昧。然而，此種書寫方式的目的，或許並非要確切分辨、定義，而是如下所述：

劉克襄更在真實紀錄與虛構情節之間的徘徊穿梭，在文學創造與實際生存以及社會權力之間交織發展，這一點正好體現了作家透過動物所展現的特殊美學、生命倫理與政治的持續探索。³

作者觀察、書寫動物，主要是希望能藉此省思動物與人類在當代可能會面臨的衝突、問題，以及彼此之間的界線該如何重新看待。牠們將有如一面鏡子，⁴讓人類了解原來自身形貌、位置是如此曖昧而非「不言自

¹ 關於對劉克襄動物書寫的探討，可參見黃宗潔，〈劉克襄動物小說中的自然觀〉，《東華漢學》第10期（2009.12），頁285-324。

² 劉克襄，《野狗之丘》（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6），頁255。以下的本書引文均於文末直接標示書名及頁碼，不另加註。

³ 李育霖，《擬造新地球：當代臺灣自然書寫》（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5），頁117-118。

⁴ 此為黃宗慧在引述文化研究者哈洛葳（Donna J. Haraway）於《猿猴、賽伯

明」，進而再去探查其間複雜的倫理、政治關係。此外，動物與人類之間也蘊含著權力流動，如何透過文字、影像等媒介去探知彼此的互動狀態和思考該如何進一步採取倫理行動，亦是須要著重之面向。就此所論，真實與虛構的混融似乎不再成為最主要的問題，文本的情節鋪排、寫作意識與倫理意涵等論題，反而才是更須聚焦的重點，而此亦是本文在開展研究時的重要動機與思索。⁵

就內容而言，二書主要以臺北的野狗和香港的街貓為觀察對象，思索這些被視為具有野性卻又顯露馴化痕跡的動物，在城市中會面臨何種挑戰，以及是否能夠加以克服，正如劉克襄在新版《野狗之丘》之序文中所述：

我描述的不止是十幾隻野狗的個別存亡，還有各自的習性。主要還是想透過牠們的一生，讓我們更了解野狗在城市環境，因了各種階段和不同生活環境下，會面臨何樣的挑戰。牠們如何避開危險，又或無法度過難關。（《野狗之丘》，頁5）

《野狗之丘》最早成書於2007年，2016年再次印行新版，但實際觀察時間則早在二十世紀末便已開始。⁶作者述及在觀察後十餘年出版和出版近十年後再出新版之因，實是由於雖然政府規定家狗皆須植入晶片，法規也不斷修正，但虐待、汙名化野狗的情況仍不斷發生，即使到2016年，野狗在城市已然少見，但郊區、鄉下的棄狗問題依舊嚴重。⁷因此，作者

格和女人：重新發明自然》（*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中的名言：「我們擦亮一面動物鏡子來尋找自我」之後的思考。此部分請參見氏著，《以動物為鏡：12堂人與動物關係的生命思辨課》（臺北：啟動文化，2018），頁18-20。

⁵ 在黃宗慧、黃宗潔的對談側記中，也提到動物書寫不一定非得囿於某一文類，重點是要讓讀者反思人與動物之間的關係，並帶入更多層面的探討與思考。此部分請參見小美記錄，〈為動物尋找寫作蜜源的人—宗慧與宗潔的對談側記〉，收錄於黃宗慧、黃宗潔，《就算牠沒有臉：在人類世思考動物倫理與生命教育的十二道難題》（臺北：麥田出版，2021），頁339-342。

⁶ 劉克襄曾提到此書「其實是在1994年就完成的觀察紀錄」，請參見黃宗潔，〈劉克襄動物小說中的自然觀〉，頁319。

⁷ 請參見劉克襄，《野狗之丘》，頁5。

便欲藉由持續更新、出版，再次分享對於野狗的觀察，希望一同思考野狗在人類追求現代化之際，變動的景觀將如何深深影響其生命型態和行為模式。另外，同於2016年出版的《虎地貓》乃是劉克襄在2012年於香港嶺南大學駐校時的觀察紀錄，較不似《野狗之丘》涉及不同版本時期的思維變化；不過，作者也觀察到貓隻在不同時空下已有不一樣的角色轉化，即「貓從農村社會馴化到城市生活，跟我們一樣變成市民和遊民」，⁸香港的虎地貓有如臺北野狗，在城市中面臨著被遺棄的危機，而且隨著越來越追求發展，其處境卻也越來越艱難，而這也正是劉克襄藉由書寫提醒讀者注意之因。

目前對劉克襄作品的探討多聚焦於動物小說的生態書寫，或是與其他作家風格的比較。⁹若是針對《野狗之丘》與《虎地貓》，則以單一文本為主，除了綜論書中的動物角色、主題內涵與創作模式，¹⁰亦探析其中的動保意涵、¹¹敘事觀點¹²以及移動路徑的意義¹³等面向，實已為相關

⁸ 劉克襄，《虎地貓》（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6），頁5。以下的本書引文均於文末直接標示書名及頁碼，不另加註。

⁹ 相關研究如呂樾，《臺灣自然導向文學中的美學與倫理：以王家祥、劉克襄、吳明益為例》（臺中：國立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7）、林雅婷，《劉克襄動物小說的創新與轉變研究》（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2）、吳宗憲，《劉克襄動物小說中的生態書寫》（臺東：國立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

¹⁰ 請參見王鳳英，《劉克襄《野狗之丘》研究——以流浪動物關懷為視角》（桃園：銘傳大學應用中國文學系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18）。

¹¹ 黃宗慧以德希達（Jacques Derrida，1930-2004）的動物觀來探討《野狗之丘》的動保意義，並認為劉克襄雖沒有在書中呈現人類與野狗眼神交會時的所思所感，但藉由擬人化口吻描寫野狗的行為與情緒，實已將其視為具有觀看、回應能力的牠者。請參見氏著，〈劉克襄《野狗之丘》的動保意義初探：以德希達之動物觀為參照起點〉，《中外文學》第三十七卷第1期（2008.3），頁81-115。

¹² 黃宗潔提及《野狗之丘》已脫離早先劉克襄動物小說中的全知敘事觀點，並轉為限知敘事，與觀察對象保持著距離。請參見氏著，〈劉克襄動物小說中的自然觀〉，頁290-292。

¹³ 黃宗潔將《虎地貓》納入劉克襄書寫香港郊野的範疇之中，並援用彼得·艾迪（Peter Adey）的「移動性」（Mobility）概念，說明觀察並非只單靠單方路徑的移動，而是須要雙方同步協調。請參見氏著，〈在移動中尋路：

研究開展更多向度。然而，若將二書並列齊觀，則可發現野狗、街貓雖屬不同物種，但也有身分上的共性，即皆是被人類遺棄、視為多餘的動物，而這亦多是作家與學者開啟書寫、探究的主因。於是，或可嘗試循此徑路，再進一步論證與思索。

關於野狗、街貓的身分形象，其實常被視為「城市的廢棄物」，¹⁴成為追求發展下的剩餘或殘餘。「餘」的概念，在教育部之解釋中，有多出、剩下、殘留、將盡、其他、不盡、未完等多重意涵；¹⁵然而，第36屆全國比較文學會議對此字則有更多詮釋：

「餘」一字有多義，包括多出（「剩餘」）、殘剩（「殘餘」）、事後（「餘生」、「餘震」）、其他（「其餘」）；其中，前兩義特別點出「過剩」和「欠缺」為餘的雙價。綜觀而言，餘特別涉及一個整體和其額外部分之間的關連變化，但兩者除了對立之外，也可有其他關係，如餘部可以是整體成立的基礎與條件：「留餘地」的策略是透過空間的設立，讓後續的關係可以完滿，而「年年有餘」——在此「餘」帶有無盡之意——汎指今年之餘將成來年能否完整的條件。¹⁶

上述列舉之義與教育部之說並無太大差別，但特別的是，此論進一步點出「餘」涉及整體與外部之間的關係變化，彼此並非能夠全然割捨或斷然二分，有著頗為複雜的聯繫；易言之，此字用法將隨攝取角度（perspective）、定位點（orientation）之不同而有所差異，甚至會從原

從劉克襄的香港書寫論港台環境意識之對話與想像》，《東華漢學》第25期（2017.6）頁211-215。

¹⁴ 此語請參見黃宗潔，《牠鄉何處？城市·動物與文學》（臺北：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7），頁108。此外，劉克襄亦提及「野狗算不算一個城市文明的一份子，還是過時的廢棄物？」（《野狗之丘》，頁231），顯見其對城市中野狗地位的思考。

¹⁵ 詳細內容請參見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網站，<https://dict.revised.moe.edu.tw/dictView.jsp?ID=11600&la=0&powerMode=0>。（2022年11月16日作者讀取）。

¹⁶ 會議之徵稿啟事請參見中國國民比較文學學會網站，<http://claroc.tw/annual-conferences>。（2022年11月16日作者讀取）。

本的定義透顯出未宣明之「餘音」。¹⁷例如許綺玲和楊志偉便從上述的比較文學會議之主題衍伸，分別探討法國日常生活書寫與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認為「餘」有著易被忽視、忘卻的不定特性，¹⁸以及與生命型態之間有著或壓迫或對抗的迥異關係，¹⁹但這些意涵大多不見於辭典的確切定義，可見是由文本、論述所指涉的上下文脈絡或語境加以闡發而來。

蕭義玲曾論及當動物現身於作家筆下時，其「賴以生存的土地景況，以及對土地施以支配力量的人類，也將隨之浮現。特別是當牠們帶著饑餓、惶然或痛苦的身姿現身，乃至拖帶著可能的滅種、消亡之命運陰影，那個從動物發出的質問力量是很巨大的」，²⁰可知此類書寫常會觸及動物的生存空間與生命時間，以及跟作為支配、掌權者的人類所產生之互動、倫理關係。若把此說和「餘」之概念結合，並檢視《野狗之丘》跟《虎地貓》，可發現與文本中的空間、時間和人類有緊密關聯。就空間而論，野狗、街貓常被城市中人忽略及嫌惡，多生存於遠離人群

¹⁷ 若從語言學角度來看，張榮興提及過去不少人認為在溝通時，語言使用者會從字詞的眾多定義中提取出一個來配合語境，但此種看法後來遭到不少質疑，一個詞或語言形式究竟有多少意思，似乎連專家學者也無法毫無疏漏地一一列舉。除了原來之意涵，字詞也可能會隨語境的上下文來建構意義，甚至產生弦外之音。請參見氏著，〈華語篇章中的攝取角度〉，《華語文教學研究》第五卷第2期（2008.12），頁50-51。

¹⁸ 許綺玲述及「日常生活本質上的不可見與未決性，那易被忽略、遺忘、漠視的傾向，和關鍵詞『餘』，顯然已具有某種基底的關聯」。請參見氏著，〈餘地、餘影、餘音：非地點、日常生活書寫，以及楓思瓦瓦的《15021》與《停車場》〉，《中外文學》第四十四卷第2期（2015.6），頁22。

¹⁹ 楊志偉提到壓迫關係為在生命政治機器此一部署機制（dispositif/apparatus）的控制下，受影響之餘存生命常流於空有形式；對抗關係則是指涉生命的內存餘力，說明其能作為與主權對抗之「抗衡部署機制」（counter-apparatus）。請參氏著，〈詩學之於生命恆餘：阿甘本論述中詩學藝術作為生命一形式典範之可能〉，《中外文學》第四十四卷第3期（2015.9），頁110-111。

²⁰ 蕭義玲，〈不只人，動物也會痛苦：當代臺灣自然與動物書寫〉，收錄於黃宗潔主編，《成為人以外的：臺灣文學中的動物群像》（新北市：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22），頁143。

和市中心的郊區，²¹雖然這些看似多出來的都市邊緣為牠們提供續命餘地，但也因是仍可開發的剩餘之地，使其成為人類在追求發展時最常被壓迫、犧牲的一群。以時間來看，即使這群街貓、野狗有人餵養、照看，但這卻讓作者擔憂，思考此舉是否會使牠們變成失能的廢餘之物，甚至面臨餘命無多的死亡威脅；然而，即便危機重重，這些動物並非只能坐以待斃，其與支配權力、部署機制對抗的求生能動性，實也展示劫後餘生的無盡可能。²²是以，本文將依上述進路，探討被視為餘物的野狗、街貓如何與棲息地空間、善意餵養及惡意捕捉的人類產生連動關係，並思索城市在追求發展之餘，人與動物如何保有轉圜餘地，以開展更多新的互動可能。

二、餘地：地理空間的多重意義

在《野狗之丘》中，劉克襄提到本書是「一個發生於上個世紀末的故事，那時垃圾不落地政策尚未實施。謹以此紀念一座城市尚未開始大量捕殺流浪狗以前，一群野狗的生活故事。」（《野狗之丘》，頁9）於是在記錄當下，仍可在街上看到野狗覓食、晃蕩的身影。在書中正文開展前，作者繪製了主要野狗分布圖，讓讀者知曉各隻狗的活動領域。就辛亥國小、辛亥路、萬美街等關鍵詞來看，可了解作者觀察的地點為文山區。雖然本區目前交通發達，不過書中敘述的時間，捷運尚在興建，而且若與信義、大安等區相較，仍是較屬市郊，但自然資源則也相對豐

²¹ 例如劉克襄提到「或許現今都市的繁忙街道，不容易看到野狗徘徊」（《野狗之丘》，頁5）、「很多人養貓，視如己出，但也有不少貓被遺棄，在外頭遊蕩」（《虎地貓》，頁5），可知野狗、街貓有如城市中被遺忘、棄置的餘物，也呼應許綺玲談到的「餘」之不可見性與未決性。

²² 劉克襄筆下的動物，並非全然被人類宰制，而是有反抗及脫逃於人類視線的能動性。關於動物是否有能動性，可參見英國·希爾妲·基恩（Hilda Kean）著，盧耕堯譯，〈動物史學〉，《成大歷史學報》第58號（2020.6），頁215-216。

富。另外，以活動範圍而言，小冬瓜、馬鈴薯、小不點常棲息的小山，或是三口組（豬頭皮、三層皮與桔子）常晃蕩的菜畦、池塘、空地，又或是豆芽菜所在的釣魚池，均是屬於自然區域；但也因為如此，使之成為許多人棄置狗隻的地點，如下列所述：

昨天新聞刊登一則新消息，全台北市的野狗開始要面對一個殘酷的事實。凡是沒有掛狗牌的都視為野狗，一律撲殺。過去，很多人知道自己無法照顧時，都會隨便丟棄。現在，他們不希望棄狗被撲殺，都會特別選擇一些離城市不遠的荒郊野外，讓這些家狗還能勉強找到吃的東西，捕狗大隊又很少出現。這或許是最近一〇一巷突然有許多棄狗出現的原因。（《野狗之丘》，頁84）

劉克襄將書中野狗分布的地方視為距離城市不遠的郊外，並由於此特性，讓許多想要棄養之人，找到一個可讓牠們免於被撲殺，又能減少自己罪惡感的「餘地」。撲殺野狗的政策在現今看來雖相當殘酷，但在當時卻被當作是革除疫病、擺脫落後的表現；²³不過此區雖然位於臺北市，卻是連捕狗大隊都甚少出現，成為「荒狗們最後的失樂園」（《野狗之丘》，頁105），或許這也透露政府在政策執行上的鞭長莫及與力有未逮，甚至隱含此區有遠離發展、進步之意。

另一條呈現此處「餘地」特徵的線索，便是野狗們的食物來源。就地圖與移動路徑來看，能發現位於小山旁邊的垃圾場可說是牠們主要的覓食場所。《野狗之丘》提到當地居民會在黃昏時，將垃圾、廚餘丟至一〇一巷的垃圾場，使野狗多喜愛在此地聚集：

對許多野狗來說，這種環境食物最不虞匱乏，也是重要的覓食場。一如人們最愛集聚的傳統菜市場。牠們以垃圾場為生活重

²³ 例如在時值農曆狗年的1994年，曾有一則新聞提到「雖然今年是狗年，理應以狗為尊，可是流浪狗汙染街頭，破壞市容環境，因此基於職責，只要接到通知，一律撲殺，維護環境衛生。」由此可知，野狗在當時被視為破壞市容、具有汙染性的餘物，理應加以排除。請參見黃漢華，〈狗年捕犬 責任心戰勝忌諱〉，《聯合報》第14版，1994年2月16日。

心，鎮日在這裡徘徊，甚至就滯留附近，集聚成小群生活。（《野狗之丘》，頁19）

就城市觀點來說，垃圾是不應出現在大街而亟需隱蔽的廢餘之物；不過，或許這也是消費力的展現，與資本主義的生成、消耗及殘剩流程有關。²⁴但對野狗來說，垃圾場的食物充足，故成為其移動路徑上的重要據點，例如小冬瓜哺育小狗時，便就近在此覓食，以避免消耗體力。甚至，因為是野狗們的生存重心，於是佔領此地者便也如同掌握權力，如書中提到「三口組一直把垃圾場視為領域範圍。任何陌生野狗接近，都得經過牠們的審視。」（《野狗之丘》，頁26）。是以，此處便也成為能延續生命，甚至帶有權力政治意味的「餘地」。

不過，這些野狗所處的地方也非全為野地，而是有住家、雜貨店、摩托車店、小學及菜市場，故人類與狗隻如何在此相處，又透顯出何種地理空間上的意義，便也值得考察。書中人與野狗的親密關係表現，有如附近菜農常常餵食，使不少野狗與他親近；又或是從家狗變為棄狗的無花果與大青魚也常翻仰肚腹，以期獲得人類關愛。當無花果生小狗時，附近路人也「經常插手幫忙，躺臥的小紙箱變成廢棄的大抽屜。這兒好像一個公開的展覽室。」（《野狗之丘》，頁168），展現人們看到野狗家庭時的關愛之情。但是，劉克襄卻對此產生隱憂：

如此狀態，或許能躲過一場浩劫吧。但一般人對野狗的關懷，往往只是一時的興起，再加上政府相關單位始終缺乏一套處理野狗繁殖的機制。野狗出生的後代，往往變成社區的負擔。久而久之，小狗們難逃被殘害的命運。（《野狗之丘》，頁169）

²⁴ 胡嘉明與張劭穎曾就垃圾與城市的關係提出看法：「城市生活處處光鮮亮麗，整潔如新。在公司、學校、住宅樓、大商場裏面流連，清潔工會隨時掃去髒東西，把垃圾丟藏在最隱蔽處。其實，我們在城市裏大量消費，大量丟棄，不但消費會帶來快感，扔掉東西也是種樂趣。」由此可知，垃圾之於城市，有如餘部之於整體，雖是棄物，但也能從中窺見消費能力，如吃到飽經營模式下所產生的廚餘便是一例。請參見氏著，〈廢品的政治與文化〉，收錄於《廢品生活：垃圾場的經濟、社群與空間》（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6），頁VII。

剛出生的野狗雖惹人憐愛，但作者卻認為這僅是暫時，只要繁衍越來越多，政府又沒有管束，就會逐漸變成累贅、負擔，關係也會由喜愛轉為厭惡，甚至會覺得牠們已經侵犯到人類的生活領域，而這也是捕狗大隊在後來經常出現於一〇一巷之因，呈現人類與野狗之間既共處又對立的矛盾關係。

然而，與上述相反，諸如小冬瓜、馬鈴薯、三口組等從小或一出生便是野狗，又或是曾受到人類的排斥、捕殺，所以便處處提防人類，個性也較謹慎。例如小冬瓜會刻意選擇小山作為棲息地，主要是因視野跟通風良好，而且少有人類出沒，作者認為此可謂「保有野狗祖先原始而機警的性格」（《野狗之丘》，頁24）；又如從車禍與人類追捕中死裡逃生的三層皮，即使面對菜農的餵食而稍感安心，但當他試圖拆解其身上的白色鐵絲圈時仍驚慌跑走，流露被人類傷害後的心有餘悸。因此，從這些野狗與人類的相處來看，可知此地作為開放空間，人類仍為主要宰制者，使野狗們或被拒斥，或被收編，而此或可與王志弘與高郁婷對臺北市街貓的觀察加以參照：

動物宛如人類街友般，在人居領域化的淨化關切下淪為嫌惡對象，但也逐漸是人類憑著善心來關照互動，但同時是納入管控或予以「收編」（收養，回歸「正軌」）的對象。²⁵

有人之處，就常有人為的管控與操作，若將上述對照《野狗之丘》中人與野狗的相處模式，便也能理解後者是否可以受到關愛，大多仍取決於人類。牠們或許是人們眼中的廢棄餘物，但也可能因將之可愛化、擬人化，故納入關愛視線並予以收編。由此可知，人類與動物的共處空間常受到人類政策、觀念或情緒的影響，容易產生波動而較不穩定。

《虎地貓》則與《野狗之丘》不同，除了將地點從臺北文山區移至香港虎地外，也從街巷置換成大學校園。「虎地」位於香港的新界屯門，雖然位處香港這座國際大城市，但若與中環、尖沙咀等地相比，仍較屬

²⁵ 王志弘、高郁婷，〈都市領域化的動物皺摺：開放空間中人與動物關係的紋理〉，《地理研究》第67期（2017.11），頁12。

於郊區。不過，七十年代開始，香港政府為因應人口增長，開始往郊區開拓新市鎮，屯門便是其中之一。²⁶然而，2012年劉克襄前往位於虎地的嶺南大學駐校時，是否景觀已有不同？此可從下述了解：

嶺大是一處封閉的環境，前有開闊公路，背後緊靠香港最為荒涼、乾旱的山區。相較於旺角、金鐘、銅鑼灣等地，這兒根本就是香港的鄉野。若以台灣對照，有點像台北與平溪、雙溪的關係，距離也差不多。加上校園清淨，因而成為家貓丟棄的天堂。（《虎地貓》，頁12）

作者先說明嶺南大學因位處偏僻，使不少人將貓丟棄於此，類似《野狗之丘》的環境，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另外，也將虎地比喻成新北市的平溪與雙溪，可知距離市中心頗為遙遠，具有城市餘部之意涵。此種港臺類比的方式，也可在書中最後以臺灣的「福州貓」作為描寫對象來了解，讓讀者感受到作者對不同城市貓隻的觀察。此種創作意義，正如黃宗潔所述，即「當踏查路徑移轉至原本陌生、語言及文化脈絡皆有所差異的城市時，他勢必要尋找一種既能與讀者對話，又能充分表達此一行旅經驗之感受的模式。」²⁷作者將觀察視線轉至香港，必然得面對兩地知識背景、文化脈絡相異的情況，而此種參照或許便可更清楚呈現其所欲傳達之意涵。

雖然地理位置偏遠是重要因素，但可再進一步思索的是，為何棄貓大多在校園裡面？又是否有別於外面的街貓？劉克襄以為除了校園清淨之外，尚有下列因由使貓隻集聚，甚至形成集團：

虎地貓各個幫派的形成，跟食物的取得有緊密關聯，次則為地理環境。若沒人固定餵食，縱使這樣寬廣的環境，都不可能形成龐大的族群，進而囿於一個小區域生活。（《虎地貓》，頁20）

²⁶ 關於香港新市鎮之歷史背景、規劃原則與發展狀況，可參閱董群，《城市多重空間的演變與互動——屯門新市鎮個案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歷史學部博士論文，1999），頁73-80。

²⁷ 黃宗潔，〈在移動中尋路：從劉克襄的香港書寫論港台環境意識之對話與想像〉，頁208。

由上述可了解，食物來源讓貓群聚攏，並形成姿態各異的團體勢力。不過，牠們的食物從哪裡來呢？若細察書中描述，便知校內有關懷動物的社團，教職員、警衛亦會固定幫忙餵食。此外，因為校園空間有所管理，使得當地街貓並非像《野狗之丘》之野狗處於行人熙來攘往或汽機車呼嘯來去的環境，故在地理空間上便與臺北文山區不同，有著看似較為安全的處境。²⁸

以虎地貓的活動地帶而言，能知曉處於校園的貓隻在安全與食物來源上似乎較為無虞，而此亦可與王志弘與高郁婷針對國立臺灣大學校園與浪狗餵養行為之間關係的考察來對照：

臺大校園作為開放空間的領域化邏輯及主導紋理特徵，乃是以具反身性之知性理想來組構校園空間，以大塊綠地、樹林和池塘水系，兼以建築物角落縫隙，構成動物棲息處所，並在專責管理單位和社團協力下，形成對於人與特定動物相對「安全」的人為或擬似自然紋理。²⁹

臺灣大學與嶺南大學雖都有一定範圍，卻也並非完全封閉，具有可供外人進出的開放性質。兩校皆有綠地、樹林與池塘，但多是在規劃時刻意打造，故才稱此為「擬自然」之型態。另外，《虎地貓》中亦提及校園並非僅有貓群，還有鵲鴝、錦鯉、巴西龜、黑眶蟾蜍、亞洲錦蛙等物種，貓隻也會與之互動，形成一個具連動關係的生態系；再加上校方與學生社團的管理，以及生命教育、保育概念在校園的提倡，人與動物的關係便也較外頭的世界穩定。然而，雖然這兩處校園皆為知性的教育空間，但畢竟地理環境有著差異，便不能等同視之。王志弘曾在文中分享其遇到就讀鄰近小學學童的經驗，學童表明如野狗等非家養動物在臺北街頭較為少見，但在位於市中心的臺大校園內卻能看見，甚至也轉述老師的

²⁸ 劉克襄述及嶺南大學容許學生照顧校園內的街貓以作為生命教育之一環，再加上校園清幽、遊客零星到來，不像臺灣猴硐湧進大量人潮，故環境品質便安靜許多。請參見氏著，《虎地貓》，頁 18。

²⁹ 王志弘、高郁婷，〈都市領域化的動物皺摺：開放空間中人與動物關係的紋理〉，頁 9。

話，表示此處動物比公園還要「野生」，也比山上安全，所以在臺北要看自然、野生又安全的動物，這裡當是優先選項，而裡面的動物便具有特別明顯的能見度，使許多人慕名而來；³⁰至於嶺南大學則不同，其本身就位處有如城市餘部的偏僻位置，才使不少人選擇在此棄貓，即便校園內有人照看、餵養，但就性質而言，這些棄貓最終仍消失在原來飼主或眾多市民的視線，有著被刻意忽略、遺忘的意涵。

不過，校園環境雖相對安穩，若牽涉到發展，動物的生存空間則可能會受到影響和壓縮。例如《虎地貓》提及因嶺南校園之大樓修建須搭設鷹架、粉刷油漆，導致地貌產生劇烈改變，而作者對此之看法為：

人類對環境的干擾，明顯地改變了一支族群的命運，包括牠們之間的關係和生態。但這只是一微不足道的小事，不會有人注意。我在台灣也遇過好幾回同樣的情形，一群貓的穩固關係和階級地位，因建築工事帶來了環境變化，整個族群的關係快速瓦解。（《虎地貓》，頁174、178）

書中提及工事產生的噪音與油漆碎屑，使棲息此處的怒臉及紅鼻子離去，也讓旁側現代花園的貓群逐漸在這裡活動，深深改變當地的族群領域和生態，而校園也從原先能給予穩定的棲息地，變成危及生存卻甚少有人關注此變化的空間。《野狗之丘》中棲息地受到的人類干擾則更為劇烈，甚至會將野狗視為秩序破壞者，例如當蛋白質和瘋子黑毛因為被輾斃的孩子闖入車陣時，人們的反應為：

這時正好是上班時間，經過的車子為了閃避，不得不彎繞。結果，迅即造成大排長龍的堵塞狀況。適才執行驅趕的交通警察，再度跑過來，一腳踢向瘋子黑毛。瘋子黑毛哀嚎一聲。交通警察再氣沖沖地揮舞警棍，趕走了蛋白質。他順手把小狗的屍體拎起，丟到旁邊的草叢。（《野狗之丘》，頁224-225）

³⁰ 請參見同前註，頁9-10。另外，其中一位審查人提醒「野生」、「安全感」涉及對象為誰（是城市居民的安全感？還是動物？）及如何看待街貓、野狗和「野性」之關係等課題，與對動物、自然的態度、認知相關。本文限於篇幅與研究視角無法盡論，此一重要論題當留待來日再行探析。

在忙碌的城市生活中，車流的移動常象徵現代性的發展和社會網絡的進行，若受到阻礙，便得盡快排除以維持順暢。³¹蛋白質與瘋子黑毛因突然闖入車陣，使得車子須閃避而造成堵塞，此時最快的解決辦法就是由象徵公權力的交通警察來驅趕。從上述可知，其行使暴力且將屍體扔至一旁，甚至後來蛋白質叨至雜貨店門口時，路過行人也因嫌惡將之拎到垃圾桶，並造成後續捕狗大隊的大肆捕殺，讓此時群狗的生命彷彿變成社會真正的多餘，無人在意及關心。

從此部分之探討可知，《野狗之丘》及《虎地貓》中的地理空間皆是偏遠的城市邊緣，有如追求發展下的餘部；但也因這些地方的多餘特性，使街貓、野狗能有棲息的「餘地」。可是，臺北文山區和香港嶺南大學之地理條件與時空環境終究不同，前者因處住宅區，許多住民生活於此，故野狗受到的擾動較為劇烈，甚至被視為影響城市運作及破壞市容的厭棄餘物；至於虎地貓所在的校園空間，人為紛擾較少，加上教學區域有所管控，並有人固定餵食，故較為無虞、安穩，但這也讓移動範圍變得狹仄和固定，且更依賴人類的餵養。不過，無論是何種環境，當現代性發展受阻或欲尋求可開發的「餘地」，原本空間的多餘意涵便被轉化為殘缺或剩餘，須加緊收編、整建，此時人類與動物們的關係緊張，後者的安定狀態也遭逢巨大威脅，甚至造成生命消逝。然而，這也表示應更注意生活環境是否因人類行為產生劇烈變動，並思考如何與動物達到互存與共生，而非讓牠們成為城市風景的多餘。

³¹ 彼得·艾迪（Peter Adey）提到：「飛航與汽車移動性使人得以從事社會活動，履行塑造和維繫關係及網絡的義務：包括渡假、從事休閒活動、同短距和長途的親友聚會，以及上班或參加商務會議。」雖然每個人移動原因不同，但現代交通工具的確能讓人們更順利到達目的地，因此受阻時便會產生不便與不悅。請參見英國·彼得·艾迪（Peter Adey）著，徐苔玲、王志弘譯，《移動》（新北市：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13），頁 248。

三、餘命：失能與死亡之預期

在統計學中，有一個專有名詞稱為「平均餘命」(Life Expectancy)，依國家教育研究院的闡釋，意指「從一個人現在的年齡算起，預期可以繼續存活平均年數。它的基本定義是如果目前各年齡層死亡率一直保持不變，則今年各年齡層的世代，預期可以繼續存活的平均年數。」³²若聚焦「餘命」一詞，可知意謂預計還可存活的時間，故此處的「餘」便不是多出，而是剩下之意；但有意思的是，英文的對應字彙expectancy，則有希望讓美好或令人興奮的事情發生之期望，似與中文的生命倒數之意相差甚遠。³³在此姑且不論翻譯是否精準，但此種語言轉譯的差異，卻也呈現「餘」在中文字義上的多重詮釋空間。就中文釋義來看，可知平均餘命並非固定，而是會隨不同階段所遇到的風險產生變化。不過，大致仍可推估，變化越劇烈，承受風險就越大，越穩定及安全，生存機率也就隨之提高，故餘命長短便深受環境影響而變動。

但是，此概念與《野狗之丘》及《虎地貓》有何關聯呢？其實在二書中，作者常對一些野狗、街貓可預期的失能、死亡感到焦慮，此正與人和動物之間的互動有關，例如下述對虎地貓中余園集團生活型態之觀察：

余園集團的主要成員，彷彿一群僧院的長老，牠們跟形單影孤的不一樣。多半無此捕魚樂趣了，幾乎仰賴學校愛心人士早晚的餵

³² 國家教育研究院之樂詞網，<https://terms.naer.edu.tw/detail/8b95fc84b1bca48d6e6a26cbfaa6447d/?startswith=zh>。(2022年11月16日作者讀取)。

³³ 經查閱「Oxford Learner's Dictionaries」，此字彙的解釋為“the state of expecting or hoping that something, especially something good or exciting, will happen.”請參見 Oxford Learner's Dictionaries，<https://www.oxfordlearnersdictionaries.com/definition/english/expectancy?q=expectancy>。(2022年11月16日作者讀取)。

食。牠們常三兩結伴，大群趴躺在餐桌區……（《虎地貓》，頁120）

上述提及此集團成員的食物無虞，大多有愛心人士餵食，而且也常聚在一起趴躺；此外，亦描述牠們的睡眠時間頗長，醒時也多是在進食，較少刺激及移動，例如逗弄魚類等行為，在其眼中便為無趣之事。是以，作者以僧院長老為喻，將牠們形容成無欲無求的老邁僧人，循此可以想像、對照牠／他們在行動上的緩慢，有著餘命無多、暮氣沉沉之感。另外，作者也形容這群貓彷彿居住在深宮，並點出牠們的問題：

池塘邊展現過度擁擠的孤單，虎地貓在這兒明顯自我退化、消逝。多數都結紮下，午夜也較難聽到街貓的淒厲叫春，或彼此之間的活絡吵架。這兒真像紫禁城的深宮大院，大家繼續被動地跟著食物，緩慢而肥胖地移動，也帶著高危險的傳染病源生活著。（《虎地貓》，頁124）

虎地貓大多已被結紮，劉克襄觀察到此多少會減少貓隻的活力，再加上沒有遠距離的移動，所以造成肥胖，甚至因為集聚而有傳播、感染病症的危險。他形容此種了無生氣的生活有如居住在紫禁城的冷宮，為余園集團下標題時，也以「深宮大院的太監群」稱之。雖然可能是因結紮關係才如此稱呼，但將牠們比喻成被去勢、閹割且生活範圍狹小的太監，便也流露對貓群健康及性命的擔憂。³⁴而且，除了移動性的弱化之外，尚有下列風險存在：

³⁴ 歷史學者姜學豪（Howard Chiang）提到在中國歷史當中，閹割（castration）從一開始的刑罰變成獲得權力的手段，太監在宮廷裡的權力多寡也與政治活動有相當關係；但從十九世紀起，西方開始將中國視為「東亞病夫」（Sick Man of Asia）或是被閹割的文明（castrated civilization），此均與太監的身體缺陷有關，並將之連結到中國的衰弱國體。若從此脈絡變化來思考余園集團貓群的定位，可知劉克襄應是以身體疾病、殘缺作為考量。關於此部分的論述，請參見 Howard Chiang, *After Eunuchs: Science, Medicin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ex in Moder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16-18.

我一直以為，牠們更瀕近與死亡為伍。一個看是美好無憂的生活環境，或許不會有食物供給的問題，但因為族群密集，某些疾病和食安的風險，始終是潛伏的巨大威脅。（《虎地貓》，頁28）雖然校園中虎地貓的食物不虞匱乏，可是劉克襄卻也點出傳染病及食物來源的問題。就前者而言，因貓隻常共用餐具，地盤亦大多固定且擁擠，於是當生病時便容易傳染，例如歪嘴、紅眼、一線均患有口炎或眼部分泌物過多等症狀；後者則指採買飼料時較為大量、單一，沒有考量到是否適合每隻貓的體質，再加上食物存放一久可能會變質，對健康便產生影響。以此來看，作者看到飼養者雖具善心，但或許亦會養成貓隻依賴的習性及忽略不同個體間的差異，進而使其須面對餘命無多的死亡威脅。

至於《野狗之丘》則不如校園環境穩定，野狗們與死亡也更加接近。例如本書的第二章「死亡，或者繼續殘存」及第三章「垃圾消失的最後時光」等標題便與生命的倒數、消逝相關，故有論者認為「本書與其說是野狗生命史，不如說是圍繞於此一社區的野狗死亡史」，³⁵此語可謂深中肯綮。另外，此種死亡氛圍亦可在描寫蛋白質所生的小狗時加以觀察：

但不遠的未來，可以想見，一個嚴苛而悲慘的命運在等著牠們。當牠們再長大，隨著母親到巷口過活時，危險就來了。或撞車、或捕狗大隊的拘捕，生存的機率其實相當低微。這是城市棄狗和野狗必然的宿命，跟其他動物在野外的命運一樣。城市郊區是野狗的樂園，也是危險而殘酷的世界。（《野狗之丘》，頁206）

新生命到來固然可喜，但作者卻論及牠們在不遠的未來，將面臨或撞車或被獵捕的重重危機，這也說明他開始預估剩餘的生存時間，雖沒有具體的預定時程，不過也即將來到。而且，作者也擔心牠們如果太依賴人類，會有類似慢性中毒的失能狀況，例如他察覺小冬瓜從原本的機警性

³⁵ 呂樾，《臺灣自然導向文學中的美學與倫理：以王家祥、劉克襄、吳明益為例》，頁39。

格到後來逐漸依靠人類餵食，便以為「一隻野狗和牠的家人，應該有自己生存的方式。這樣餵食並不盡然允當，反而會害了小冬瓜母子，讓牠們養成依賴性。」（《野狗之丘》，頁196）在作者認知中，野狗要有自尋食物的能力，不應全靠人類餵食，這也與對虎地貓的看法一致，流露其對這些街貓、野狗生存之道的想像。另外，某些狗隻因為從家寵變成野狗，尚未適應身分的轉換，故與人類仍相當親近，但作者卻認為此具有致命性：

無花果和大青魚遇見路人時，只要路人表現和藹的行為，就萌生跑過去跟人玩耍、被人搔癢、擁抱的渴望。這種天真的行為，對一隻野狗其實是相當致命的表現。牠們已然籠罩在更大的死亡陰影下。（《野狗之丘》，頁109）

作者研判無花果與大青魚可能是被以較溫和的方式遺棄，非被惡意驅離，加上未意識到自己已成野狗，所以仍有依賴人類的性格。此雖然展現樂觀而不絕望的態度，但也並非好事，甚至有致命的危險，呈現出對這些動物失能的恐懼與擔憂，以及與人之間的界線該如何拿捏之思索。

與上述不同，有些街貓、野狗則是對人類、周遭環境時常保持警戒，劉克襄認為這樣能拉長餘命時間，提高生存機率，此可從其對虎地貓一條龍的描寫理解：

一條龍具備探險和統治的性格，多數貓領域小，更不敢離開校園環境。牠總是要到處走走。唯有走很長的路，漫遊自己的領域，每天巡視那麼一回，才能安心和滿足。（《虎地貓》，頁44）

一條龍性格獨立，喜愛探險，沒有一條固定的巡視路徑，勢力範圍亦比一般虎地貓所處的籃球場大小多出許多。而且，牠也常神出鬼沒，導致龜塘附近的貓群或是跑單幫的三條相當緊張，在校園中具有頗高地位。至於每天巡視才能安心、滿足，則是因為多疑個性才如此。劉克襄在描寫剛生小貓的黑斑時，也提到「多疑則讓牠活得長久」（《虎地貓》，頁83），可知此種特質將有利於生存，因此便也有著對餘命長短進行估

算之意。此外，母貓黑斑尚有一個特性，即把多處下水道作為隱藏之地，以保護自身安全，作者對此之看法為：

不少虎地貓都有一兩處熟悉的下水道做為窩居、避敵之地。下水道勢必跟其他地方連接，有些會從甲地鑽入由乙地冒出。那是一個神祕而難以窺探的世界，像許多貓展露的，深邃又縹緲的心思。但無尾只選擇一個入口進出，不像黑斑有三四處。（《虎地貓》，頁92）

上述提及黑斑與其他虎地貓之所以不同，是因為牠的多疑性格，是以有多處的進出地點及複雜的移動路徑，以提高生存的可能性；不過，通往下水道的地洞卻也可能成為死亡路口，例如褐嘴進去後不久便被發現陳屍於洞口外，或是可能罹患貓愛滋而餘命無多的陌生客亦喜愛往裡面躲藏。然而，下水道雖如雙面刃，但若與地面上相較，作者似乎以為躲進黑暗的下水道，會比在光亮的地面來得安全，故當他預想黑斑過沒多久就要帶著孩子跳下下水道時，也難怪會發出「迎接牠們的地面，恐怕會是更加嚴峻的環境」（《虎地貓》，頁80）此擔憂之語了。

在《野狗之丘》中，除了小冬瓜、馬鈴薯與三口組等因長期在外晃蕩或曾被人類欺侮而常保機警性格之外，亦可從瘋子黑毛的行徑來觀察：

瘋子黑毛的活動卻不是為了某隻母狗的發情，做出如此莽撞的決定。毋寧是身為一隻野狗，總會有一兩隻，不同於其他，嘗試著超越先前的生活範圍，表現出與眾不同的行徑。瘋子黑毛便是這樣的典型。牠的行徑，意外地，在這個區域裡，把流浪這個字義帶進了其他野狗的生活裡。牠合該是野狗裡的吉普賽人吧。（《野狗之丘》，頁71）

一般而言，野狗會脫離棲息領域並前往陌生之地，是因其他地方的母狗發情或環境劇烈改變才如此，否則大多僅會待在熟悉範圍，避免未知可能帶來的風險。所以，就「流浪」而言，大多也只是浪漫的想像。雖然作者覺得瘋子黑毛的舉止較為特殊，但無意將其與眾野狗比較，認為牠

是最「野」的一隻，畢竟每隻野狗性格各異，不宜以單一標準而論。不過，此種如吉普賽人的個性與行徑，常常大範圍地遊蕩，卻也讓牠逃過數次捕狗大隊的獵殺，成為增長其餘命的保命符，得以安然無恙。

以一條龍、黑斑及瘋子黑毛的行為來看，劉克襄雖沒有認為牠們是街貓、野狗的唯一典型，但也感受到其因大範圍活動，與機警、靈敏甚至多疑的個性，使得存活機率提高，與死亡有著較遠距離。於是，移動便不是只能代表隨處漂泊或居無定所，反而可與體制形成對話或抵抗的關係，如林文源所言：

在位移、佈署與體制之間，行動能力構成與轉變的考察，成為連結行動者與體制互動的經驗性取徑，有助於理解行動者面對體制的各種行動經驗。³⁶

雖然此論是針對人類作為行動者的位移觀察，但或許也能視作動物移動意義上的參照。牠們的行動大多有著目的，例如前往某地覓食、尋找同伴，或是追求、躲避某些人事物和體制；即使是沒有目標的晃蕩，也不會離開自己熟悉的領域太遠，因為未知的地方充斥更多危險。就此類型態來看，牠們可謂既欲逃離卻又不完全脫離人為建構的佈署體制，形成個體與牠者、人類及空間的互動紋理。³⁷然而，劉克襄雖把移動能力和機警與否視為餘命多寡的考量要素，但也並非反對牠們與人類及其建構的體制互動，畢竟跟人類接觸已屬難免，不過如何建立適宜的互動關係仍須更準確的拿捏及思索。

黃宗慧曾論及在讀完《虎地貓》後，感覺作者似乎對貓的野性有較為固定的想像，並認為因為牠們生活於城市之中，不得不「要適應環境

³⁶ 林文源，《看不見的行動能力：從行動者網絡到位移理論》（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14），頁 366。

³⁷ 王志弘與高郁婷曾轉化林文源之說，認為行動主體與不同空間、情境的互動關係，會產生各自相異的紋理，並表示面對都市中由人類打造的穩定紋理，動物並非只能是弱勢的行動者或被動客體，而是可具有擾動並形成皺褶的力度，甚至促成人類主流領域化的反思。請參見王志弘、高郁婷，〈都市領域化的動物皺摺：開放空間中人與動物關係的紋理〉，頁 6-7。

因素、要生存」，³⁸故最好具備與人互動的能力，如此亦能開展人與動物之間相處的新可能。此語固然深具見地，也提醒要重新思考看待街貓、野狗的方式；不過，作者卻也擔憂這種相處的新契機若無警覺，便有失能的危險。關於失能之描述，可從孫小玉的論述了解：

身體是權力角勁的場域，失能者因為有不同的身體，它脆弱的物質性無法抵擋能者意識形態及權力的宰制，致使他難以建構應有的主體，甚者，其受教、工作、及參與公共空間的機會亦飽受剝奪。這樣的身軀潛藏了深厚的政治意涵，從自我認同危機、被邊緣化、被隔離、被歧視、到被剝奪公民權及生存權等現象，皆可謂為高度政治的操作的結果，然而在主流社會中這些問題卻隱而未現，或被視為正常。³⁹

上述雖以人類作為論述對象，但也許亦能試著將之用來思考劉克襄筆下的野狗、街貓。失能並無絕對定義，也與個人認知相關，但在作者筆下，卻可感受到其對動物過於倚賴人類而導致無法覓食、移動的擔憂。《野狗之丘》中，野狗面臨的最大危機便是如何在車水馬龍的城市中求生存，以及逃避人類的追捕；至於《虎地貓》，則可發現雖然環境較為安適，但疾病的傳染卻常使貓隻失去進食或活動能力，甚至被同類的牠者厭惡及邊緣化，自我認同逐漸低落，並退出原來的團體活動。然而，即使二書描述的環境、危難各有差異，但共通點卻是不少的狗隻、貓群均依賴人類餵食，致使其有著失去能動性和主體性的危機，甚至最終造成生命消逝。作者提醒讀者，城市中人與動物的互動，是否會因人類習慣導致隱而未現、習焉不察的問題？例如人們常以自身想像、認知餵食動物，但殊不知忽略了每隻野狗、街貓的體質差異。若能將人類常有的印象、行動陌生化或距離化，並重新省思是否皆能一體適用，也許這

³⁸ 蔡俊傑整理，〈凝視地表三十公分的驕矜與哀愁——黃宗慧對談劉克襄〉，《印刻文學生活誌》第十卷第12期（2014.8），頁53。

³⁹ 孫小玉，〈從偽裝到扮／表演：失能者的身體政治〉，《英美文學評論》第22期（2013.6），頁117。

些常被視為整體的動物就能有分殊的契機，使各自的獨特性有被看見的機會。

四、餘生：朝向生命的開放可能

在《野狗之丘》及《虎地貓》中，位於不同城市的野狗、街貓各自承受著諸如飢餓、撞車、捕殺等重重劫難；不過，即使籠罩在死亡陰影之下，卻仍有逃生、倖免的可能，甚至可以勇敢邁向未知的「餘生」。此時的「餘」，便同時具有事後的殘剩及無盡之意，並著重在未來生命的開放性，與餘命的倒數計時意涵有著不同的參照點。正因餘生指向不可知，是以才有更多可能性，這也是作者除了凝視死亡之外，另一個重要的創作動機。因此，本部分便聚焦於劫難後倖存者的餘生，以期對人與動物之間的相處及生命能動性有所探討。

前述曾言有論者認為《野狗之丘》應可視為城市野狗的死亡史，此觀點確有其相應之處，因為野狗最後幾乎覆亡，僅餘馬鈴薯與小冬瓜這對母子倖存。然而，作者的寫作原意，並非是刻意要將全部故事寫成悲慘事件，此可從〈野狗與我〉這篇新序了解：

這個日記體形式的寫實紀錄，儘管不能照著夢想中的動物故事藍圖進行，但總是希望能努力維繫著，年少時美好結局的想像，至少還存在著一絲希望。而自己也能夠透過長時的觀察方式，精準地描述野狗的常見行為。同時還能分享更多正面力量，以及願意更熱情地善待動物。（《野狗之丘》，頁4）

劉克襄提到《野狗之丘》為何耽擱許久才寫就，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就是過程中悲傷多過歡樂，使其久久無法消化。雖然不喜歡帶給讀者太多負面情緒，但現實總有各種意想不到的震撼，故才在書中寫到許多野狗的死亡。不過，他也並非對此絕望，而且希望能分享更多正向力量，使讀者對如何善待動物有所思考和行動。依此而言，馬鈴薯與小冬瓜

在書中的最後發展，或許便能呼應作者對結局的想像，下述便先就此予以探討。

在書中最後捕狗大隊強力捉捕野狗的場景裡，馬鈴薯可謂遭受極為殘忍的對待，其躲在暗黑的溝縫，被前端裝有尖刺鐵器的棍棒猛力刺戳而奄奄一息；但是，牠沒有就此死去，而是滿身污血回到小冬瓜身邊，並欲逃離到附近隧道的另一邊尋求新生。然而，隧道可說是一個既危險又全然未知的地方，如以下描寫：

隧道的方向，除了汽機車快速奔馳，少有野狗現身。縱使有野狗往那兒去，還未抵達隧道就折回了。隧道本身像一個陰暗的黑洞，幾乎沒有野狗敢貿然進入。（《野狗之丘》，頁68-69）

一般來說，野狗通常不會脫離自己熟悉的領域，如果發生此種情形，則大多是特殊情況。隧道對牠們來說就像黑洞，再加上汽、機車在此急速通行，更是不敢隨意穿越。但是，對劫後倖存的馬鈴薯而言，或許是知道自己已退無可退，讓隧道反而具有一種吸引力，使牠想往那裡邁進，而作者對此種行徑則認為：

馬鈴薯會採取如此違背常情的行徑，在動物的行為其實並非特殊的例外。許多候鳥就有所謂的迷鳥，原本該在浩瀚的天空裡南北遷徙，卻在不可能的時節，在不應該出現的地方滯留。廣漠的海洋裡，鯨魚偶也如此，莫名其妙地擱淺，或者游入大河裡。野狗自不例外，在某種不明的情況裡，表現出一種違反野狗生活既有的定理。這種冒險，可能來自環境的壓迫和改變，更有可能，來自個性使然。（《野狗之丘》，頁232-233）

無論哪種動物，或多或少都有脫離常情之例，劉克襄在上述將馬鈴薯比喻為莫名迷失的候鳥及擱淺的鯨魚，說明此種不合時宜的行為多是環境壓迫與個性使然。就環境的改變而論，主要原因為受到捕狗大隊的圍捕，使得牠無路可退，只能試著往隧道另一邊闖去；以個性來看，其曾因菜市場有一隻母狗發情，自行越過大馬路並沿著巷弄抵達陌生之地，這對牠可說是全新體驗：

牠突然有種快樂的啟蒙，空氣裡浮滿了許多過去不曾嗅聞的味道，緊張而危險，卻又充滿刺激，好像感覺到另一種可能。不，是很多種可能。那是可以用生命去冒險嘗試的。（《野狗之丘》，頁213）

此處馬鈴薯不害怕離開自己熟悉的地方，反而由於此種移動經驗而異常興奮，有如發現新大陸，感受到原來生命有著如此多的可能性。因此，由其行徑來看，可知馬鈴薯具有冒險性格，比較不會拘限於同一處，而這亦呼應作者對其個性的觀察。

此外，若觀察馬鈴薯最後的舉止與移動路徑，或許也有意義，並可從彼得·艾迪（Peter Adey）的論述切入：

移動性是有路線、有界線，而且受到限制的。用來支持以迥異方式理解移動性的其他形象，則沒有這些限制。它們被賦予的意義，隱含的不是嚴格、永恆和確定，而比較是短暫且飄忽不定，一種自由的意義……⁴⁰

移動有起點與終點，而且久而久之會形成一個固定疆域（territory），例如《野狗之丘》中的野狗，無非就是圍繞小山、垃圾場及一〇一巷等端點移動，雖然路線不一定每次相同，卻也不難掌握蹤跡。但是，馬鈴薯的行徑，卻是跳脫常見的野狗慣習，展現主體的自由意志和能動性（agency）。關於能動性一詞，重點主要在於「個體如何能突破結構的限制，開展（抗拒權力的）行動」，⁴¹並與自由、創造力相關，使個體有著改變的可能性。馬鈴薯因受到象徵權力的捕狗大隊追捕，再加上環境的驟變、狗群的覆滅，才使牠有逃逸的欲望及行動。牠最後進入隧道，幸運地遇到堵車而有餘裕緩緩前進，並「嗅聞著另一方洞口的空氣，感覺愈來愈清新。隧道另一邊的亮光，逐漸由一小片緩緩放大。」（《野狗之丘》，頁233）其結局在此嘎然而止，但透過嗅覺跟視覺的描寫，可感受情況似乎不會再更糟，而且越來越亮的彼端也透顯在死亡的陰影

⁴⁰ 英國·彼得·艾迪（Peter Adey）著，徐苔玲、王志弘譯，《移動》，頁77。

⁴¹ 游美惠，〈能動性〉，《性別平等教育季刊》第63期（2013.6），頁93。

下，仍可能有一絲生機。或許，這是劉克襄刻意的安排，藉由馬鈴薯歷經劫難後的餘生，為這些受盡無情磨難的野狗與不忍卒讀的讀者們，給予一些溫柔和希望。

小冬瓜則與馬鈴薯不同，牠在捕狗大隊大肆捕捉後回到熟悉的車棚，沒有跟隨馬鈴薯前往遠方，並持續接受菜農餵養。其最後的結局為：

牠恍然睡著時，感覺頸上好像套了什麼。有點緊張地睜開眼，看到菜農繼續蹲在前面，正用雙手把一張狗牌掛在牠的脖子上。小冬瓜沒有掙扎，安然地接受了垂掛。在菜農離去後，繼續趴在車棚下睡覺。（《野狗之丘》，頁235）

上述是《野狗之丘》整體故事的收束，⁴²藉由被菜農垂掛狗牌，象徵結束在外晃蕩的生活，並開啟其劫後之餘生。此種安排並非封閉，反而充滿想像與未知，而且就菜農在本書的行為來看，也較捕狗者、交通警察等對野狗不友善的人類更讓小冬瓜放心，所以最後雖然感到有些緊張，卻也沒有太多掙扎。文字結束後，隔頁隨即附上小冬瓜與小狗的照片，並寫著「隔年，油桐葉飄落時，小冬瓜再度成為母親，產下了第五代的新生命。」（《野狗之丘》，頁236）由畫面可知，小冬瓜正在哺育第五代的新生小狗，代表生命不斷綿延、繁衍。此處有意思的是，書中並未提到小冬瓜產下第五代小狗之事，反而在最後照片的輔助文字中呈現，可謂在文本正文之外加上同時涵納多出、剩餘跟無盡之意的「餘論」、「餘影」；是以，文、圖間能否完全符應，還是有既疊合又歧出的可能，便也值得觀察、思索。⁴³

⁴² 因本書最後兩篇附錄〈狗大便〉與〈狗咬人〉主要談論作者對野狗的認知以及在各地小學講演之經驗，內容跟前述生活在文山區的野狗群較無關聯，故先不歸入整體故事的範疇之中。

⁴³ 衣若芬認為在「文圖學」議題中，文本與圖像間除了彼此互文、補充之外，亦可能產生差距、衝突、曖昧、背離，二者具有多重關係，故在解讀文本時不能僅以單一視角而論，參見氏著，〈文圖學——學術升級新視界〉，收錄於《東張西望：文圖學與亞洲視界》（新加坡：八方文化創作室，2019），頁356。在與本文相關之研究中，呂樾於碩士論文有專闕一節探討《野狗之丘》對照片的運用，其認為照片除了能增加可信度並具見證性，也因正文

此處菜農的角色可再進一步探究，他在本書一開始就出現在小山，讓小冬瓜、馬鈴薯與小不點相當害怕而趕快離去；接著他持續餵養附近野狗，並不時到車棚照看，使不少狗隻與他越來越親近。然而，這是否會像虎地貓一樣，讓野狗產生依賴呢？若從他對無花果的舉動來看，似乎可看到這之間的差異：

無花果竟出現在社區門口了。怎麼回事呢？原來，牠並不是被捕狗大隊捉走的，而是被一戶人家帶出去旅行，今天才現身，但牠的窩已經被毀。菜農向其吆喝，試著催趕，希望牠遠離這兒。牠卻仰躺著，露出肚腹，一副委屈樣。（《野狗之丘》，頁182）

無花果由於在一〇一巷生產，讓路過的不少人為其供應紙箱、衣物，甚至幫忙洗澡，但此舉亦讓作者懷疑是否正確？還是會害了牠們，使其無法適應外頭的冷漠世界？其實，菜農在無花果生產的第一時間也提供牛奶及雨傘等援助，可見他與前述之人並無二致。後來因為以為無花果已被捕狗大隊捉走，於是狗窩被毀，但最終才發現是被某戶人家帶去旅行。照理說，無花果再次出現應該值得喜悅，但為何菜農會希望牠遠離呢？也許，是因為如同作者對動物依賴人類的擔憂，才会有此舉動。由此可知，菜農並非一味餵食或提供援助，而是會思考人類與動物之間應保持何種適當距離；不過，這也並非是不要介入，而是要有所自覺，才能維繫平衡與不過度干涉。⁴⁴是以，最後小冬瓜願意讓菜農掛上狗牌，

的搭配而不至於產生過於奇觀之想像。不過，須注意的是，圖文間某種程度上雖為共構關係，但如衣氏所述，實際上卻不一定能完全契合，況且圖像也涉及觀看視角、表情姿態和敘事鋪排等文字無法盡論之部分，故在彼此互文以外的「餘影」或「餘論」，應可再有更為細緻、多向的觀察。關於呂樾之論述，請參見氏著，《臺灣自然導向文學中的美學與倫理：以王家祥、劉克襄、吳明益為例》，頁 42-47。

⁴⁴ 黃宗慧曾提到雖然劉克襄想盡量保持客觀、不干涉，但實際上書寫與觀察在某種程度上已算是相當自覺、克制的介入，這與菜農的行徑或許也能相互呼應。另外，她也曾詢問劉克襄是否就是菜農，但他表示並非如此而是真有其人，不過以菜農的態度來看，他與作者的理念應該頗為接近。此部分的對談，請參見蔡俊傑整理，〈凝視地表三十公分的驕矜與哀愁——黃宗慧對談劉克襄〉，頁 58。

讓他共同參與自己的餘生，或許也就是作者的願景，期望人類與動物之間能達到和解，並共創一種嶄新的相處關係。

與上述的野狗處境不同，虎地貓因生活在較為安全的校園空間，故經歷的災難相對減少許多；但這不代表牠們不會遇到生存危機，例如校園景觀的整修便對貓群造成莫大衝擊。不過，此種地景變化在《虎地貓》的「加映場」中，更常成為貓隻的挑戰，於是接下來便就此部分探討貓隻在面臨環境劇變時會如何應對與行動，以開展未知的餘生。

作者在「加映場」中，將視線從香港移回臺灣，並以辛亥路一〇八巷的貓隻做為觀察對象。雖然生活型態不同，但牠們也得面臨共同的問題，那就是地理空間的變化：

都市不斷變更的社區地景，儼然如森林裡看到一棵棵樹木被砍伐。在這樣惡劣的環境改變下，街貓往往失去生存的機會。快速更迭興起的建物如猛獸，不論街貓再如何熟悉繁複的家園，那橫越常充滿危險和驚悚，隨時會被吞噬。（《虎地貓》，頁218）

無論是房屋修繕或路段施工，都可能讓街貓不再熟悉原來的家園，甚至導致生態及生命上不可逆轉之影響，而此亦使原本多在一〇八巷活動的貓隻一夕消失，作者也為避免觸景傷情而時常繞路回家。然而，兩年後巷口舊房重新竣工，劉克襄在某天卻赫然發現消失已久的白足與小黑，並有了以下互動：

白足雖有警戒，明顯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還願意接納我。小黑更不用說，彷彿狐狸遇見小王子般，帶著曖昧的絮語，一直對我豎耳喵喵叫。那不只是要食物，好像也在問候我，還好嗎。（《虎地貓》，頁220）

白足在一〇八巷及附近地區頗為活躍，常穿梭窄小的街頭巷弄，並會不斷改道，類似虎地貓中的一條龍；再加上體型壯碩，故常成為當地其他貓隻的威脅。小黑則也是跑單幫，但順從白足，足跡範圍較小。此時，牠們與作者久別重逢，使作者以《小王子》中的狐狸與小王子來比喻彼此。關於二者之關係，周保松指出狐狸的出現是為了教導小王子「馴

服」、「負責」之道理，並建立獨一無二的關聯（ties）。⁴⁵雖然劉克襄與各隻街貓的關係不能以「馴服」來解釋，而且白足、小黑與作者也無獨一無二的專屬關係；但由作者的論述可發現，小黑和白足已經有別於過往保持一定的距離及疑懼心態，而是罕見地接近作者，讓其感受到不曾有過的善意，故彼此似乎有著更為親近的可能。另外，牠們也以歷劫後的強韌生命力帶領作者更深入思考人貓之間的相處之道，並表明牠們在周遭環境劇烈變化時都能努力撐過，相信接下來的餘生亦能如此。

劉克襄在《虎地貓》最後描寫遇見大青母子的經過，當時大青正帶領四隻小貓一一從高處的冷氣機躍下，過程則讓作者相當緊張，畢竟如果失敗，可能就會危及性命。不過，幸好最後皆安全落地，這也讓作者對牠們的未來充滿想像：

緊接著，全家出發了。大青鑽入一戶人家的屋頂，其他小貓也陸續跟進，後腿有些受傷的那隻，一樣緊跟在最後。牠們開始探看這個危險而新奇的世界。接著會是怎樣的旅途，又會在哪落腳呢？真巴不得化身為其中之一，參與貓媽媽大青擇選的行程。

（《虎地貓》，頁232）

對小貓來說，牠們歷經大劫後的餘生正要開始，準備探索充滿危險卻又新奇的世界，此時劉克襄恨不得化身為貓，希望一同參與這趟旅程。此處有意思的是，作者不以人為本位，而是希望以貓的角色來感受牠們所經歷的世界。雖然敘述並無繼續發展，但就此而言，人與貓的界線似乎有靠近的可能，也較不同於原先抽離的觀察視角。但是，很不幸地，作者再遇見這一家時，只剩下一隻小貓倖存，並說明此實為街貓常見的狀況。最後，牠們母子也跟黃耳及小葫蘆一樣，因為附近整修工程的影響而消失，徒留作者懷念著這群福州貓，並猜想香港的虎地貓是否仍安然生活，繼續想像著牠們的餘生。

⁴⁵ 此部分內容參見周保松，《小王子的領悟》（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7），頁75-81。

李育霖在探討舞鶴的小說《餘生》時，曾提及「川中島的『餘生風景』至少包含兩種時間，過去與當下，兩者之間存在著『秘密協議』，並以特殊的方式相互呼應」，⁴⁶呈現餘生與時間的複雜關聯。若借此概念檢視這部分的討論，可發現劉克襄呈現野狗、街貓的過去，目的並非要完整重現歷史現場，而是希望在書寫及閱讀過去的當下，對人與動物之間的倫理關係有更多省思，這便也是兩者之間的「秘密協議」。雖然《野狗之丘》與《虎地貓》的主角們各自經歷了捕狗大隊捉捕及地貌劇烈變動等不同劫難，但無論是小冬瓜、馬鈴薯等野狗，還是白足、小黑及大青、小青母子等街貓，牠們倖存的生命接下來仍有許多無盡可能，甚至人類與動物也能有和諧共存而非針鋒相對的契機。

五、結語

劉克襄在《野狗之丘》及《虎地貓》中，主要以臺北文山區辛亥路附近的野狗，以及香港虎門嶺南大學內的街貓為觀察對象，希望對牠們的生態活動、行為習性有所觀察，也期冀藉由文字、圖像喚醒人類對流浪動物的尊重，並思考動物權利、倫理界線等議題。野狗與街貓雖是不同物種，但卻有共同身分，也就是常被視為城市的多餘，甚至認為牠們會對進步、理性與秩序產生威脅而須加以排除。不過，就「餘」的中文字義而言，並非只有多出，同時也有剩餘或無盡之意，不一而足，端看使用時的語境脈絡而定。若以此概念觀察《野狗之丘》及《虎地貓》，便會發現可與野狗、街貓生存的地理空間及生命型態有緊密關聯，並涉及景觀變遷、死亡焦慮與未來想像等面向。因此，本文便以「餘地」、「餘命」和「餘生」三個概念，逐一開展相關的討論與思索。

⁴⁶ 李育霖，〈川中島的歷史：論舞鶴《餘生》中的時間與內蘊倫理〉，《文化研究》第16期（2013.3），頁15。

首先，「餘地」乃是就地理空間而言，雖然野狗、街貓生活的環境分別為擾攘的街道巷弄和幽靜的大學校園，但二者同是遠離市中心的邊緣，如同城市餘部，給予這些動物有稍微喘息及續命的空間。然而，邊緣的特性正在於既可是多餘，也能是剩餘，在權力關係上同時有著排除與納入的雙重性。因此，原本可供勉強生活的多餘之地，也因追求發展變為人們眼中待開發的剩餘之地，進而導致景觀變異，影響動物們的生存。就此來說，可知地理空間往往受到人為操控，但動物們卻只能被動承受，故劉克襄便提醒應注意景觀變動帶來的劇烈影響，而且須省察人類與動物如何在同一地理空間中達到共生。

其次，「餘命」概念主要與生命時限相關。在統計學意義上，此名詞代表仍可繼續存活的時間，但另一方面也是指剩下多少時間可活之意，並會隨不同的環境因素改變時距長短。簡言之，危險越多，餘命越短；危機減少，與死亡的距離便增長。在劉克襄的文字中，不難感受到他時常對這些動物流露出餘命無多的擔憂，例如城市裡除了充斥著撞車或被捕獵的危機，也認為善心人士的餵養雖讓動物的食物來源無虞，但也可能使牠們產生依賴，進而有失能、難以求生的風險；與此相反，移動性越強的動物，體力與活力較佳，生存機率便也提升。然而，這樣的擔憂也是揭示要重省人類與動物彼此的互動關係，避免讓某些出自善意的行為變成適得其反，甚至造成致命威脅。

最後，「餘生」多指經歷災劫後的倖存生命，正因生命指向的不可知，於是便有朝向未來開放的特性。劉克襄筆下的野狗、街貓，雖然經常受到死亡的威脅，但不代表牠們只能坐以待斃，而是也有回應的能動性。無論是馬鈴薯的遠行、小冬瓜的繁衍，或是福州貓的復返，在在都涵蘊著歷劫後的生命力與行動力。雖然有些情節經過調整，⁴⁷但也呈現

⁴⁷ 劉克襄在《野狗之丘》的後記提到本書內容雖然十之八九按照事實的發展鋪陳，但「唯有一隻野狗的命運，有感於過度悲涼，特別賦予了一個較為美好的結局。」（《野狗之丘》，頁 255）由此可知，作者在書寫時雖依照事實陳述，但也有更動、改寫的情形。

作者的意圖與期望，並希冀讀者能藉此了解這些動物並非城市的廢棄餘物，而是活生生、具有感受能力之生命，使得人類與動物之間的倫理界線，有重新看待、組構的可能。

綜言之，過往二書的相關研究大多著重在人與動物之間的倫理關係，以及動物如何因人類而邁向死亡，此固為重要課題，也是本文極為關心之要項。但是，地理空間之因素及動物本身的能動性卻也不可忽略，故本文透過「餘」的多義性，發掘地理空間如何為動物帶來危機與轉機，以及怎樣影響其與人類之間的生命互動，當中所融攝的多出、剩下、無盡等數種意涵，呈現出動物、人類與空間的複雜聯繫，實值得進一步關注和探析。

主要徵引文獻

一、近人論著

(一) 專書及專書論文

衣若芬主編，《東張西望：文圖學與亞洲視界》。新加坡：八方文化創作室，2019。

李育霖，《擬造新地球：當代臺灣自然書寫》。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5。

林文源，《看不見的行動能力：從行動者網絡到位移理論》。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14。

周保松，《小王子的領悟》。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7。

胡嘉明、張劭穎，《廢品生活：垃圾場的經濟、社群與空間》。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6。

黃宗潔主編，《成為人以外的：臺灣文學中的動物群像》。新北市：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22。

黃宗潔，《牠鄉何處？城市·動物與文學》。臺北：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7。

黃宗慧、黃宗潔，《就算牠沒有臉：在人類世思考動物倫理與生命教育的十二道難題》。臺北：麥田出版，2021。

黃宗慧，《以動物為鏡：12堂人與動物關係的生命思辨課》。臺北：啟動文化，2018。

劉克襄，《野狗之丘》。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6。

劉克襄，《虎地貓》。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6。

【英】彼得·艾迪（Peter Adey）著，徐苔玲、王志弘譯，《移動》。新北市：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13。

Howard Chiang. *After Eunuchs: Science, Medicin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ex in Moder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8.

(二) 期刊論文

王志弘、高郁婷，〈都市領域化的動物皺摺：開放空間中人與動物關係的紋理〉，《地理研究》第67期（2017.11），頁1-32。

李育霖，〈川中島的歷史：論舞鶴《餘生》中的時間與內蘊倫理〉，《文化研究》第16期（2013.3），頁7-46。

孫小玉，〈從偽裝到扮／表演：失能者的身體政治〉，《英美文學評論》第22期（2013.6），頁113-146。

許綺玲，〈餘地、餘影、餘音：非地點、日常生活書寫，以及楓思瓦瓦的《15021》與《停車場》〉，《中外文學》第四十四卷第2期（2015.6），頁17-48。

張榮興，〈華語篇章中的攝取角度〉，《華語文教學研究》第五卷第2期（2008.12），頁47-67。

黃宗潔，〈劉克襄動物小說中的自然觀〉，《東華漢學》第10期（2009.12），頁285-324。

黃宗潔，〈在移動中尋路：從劉克襄的香港書寫論港台環境意識之對話與想像〉，《東華漢學》第25期（2017.6），頁203-228。

黃宗慧，〈劉克襄《野狗之丘》的動保意義初探：以德希達之動物觀為參照起點〉，《中外文學》第三十七卷第1期（2008.3），頁81-115。

游美惠，〈能動性〉，《性別平等教育季刊》第63期（2013.6），頁92-94。

楊志偉，〈詩學之於生命恆餘：阿甘本論述中詩學藝術作為生命——形式典範之可能〉，《中外文學》第四十四卷第3期（2015.9），頁105-148。

蔡俊傑整理，〈凝視地表三十公分的驕矜與哀愁——黃宗慧對談劉克襄〉，《印刻文學生活誌》第十卷第12期（2014.8），頁48-61。

【英】希爾妲·基恩（Hilda Kean）著，盧耕堯譯，〈動物史學〉，《成大歷史學報》第58號（2020.6），頁207-230。

（三）學位論文

王鳳英，《劉克襄《野狗之丘》研究——以流浪動物關懷為視角》。桃園：銘傳大學應用中國文學系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18。

呂樾，《臺灣自然導向文學中的美學與倫理：以王家祥、劉克襄、吳明益為例》。臺中：國立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7。

吳宗憲，《劉克襄動物小說中的生態書寫》。臺東：國立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

林雅婷，《劉克襄動物小說的創新與轉變研究》。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2。

董群，《城市多重空間的演變與互動——屯門新市鎮個案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歷史學部博士論文，1999。

（四）網路資料

中國民國比較文學學會網站，<http://claroc.tw/annual-conferences>。2022年11月16日作者讀取。

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網站，<https://dict.revised.moe.edu.tw/dictView.jsp?ID=11600&la=0&powerMode=0>。2022年11月16日作者讀取

國家教育研究院樂詞網，<https://terms.naer.edu.tw/detail/8b95fc84b1bca48d6e6a26cbfaa6447d/?startswith=zh>。2022年11月16日作者讀取。

Oxford Learner's Dictionaries，<https://www.oxfordlearnersdictionaries.com/definition/english/expectancy?q=expectancy>。2022年11月16日作者讀取。

（五）報紙文章

黃漢華，〈狗年捕犬 責任心戰勝忌諱〉，《聯合報》第14版，1994年2月16日。

Selected Bibliography

- Lee Yu-Lin. *The Fabulation of a New Earth: Contemporary Taiwanese Nature Writing*.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2015.
- Huang Tsung-Huei, Huang Tsung-Chieh, ed. *Jiusuan Ta MeiYou Lian: Zai Ren leishi Sikao Dongwu Lunli Yu Shengming Jiaoyu De Shierdao Nanti*. Taipei: Rye Field Publishing Co. 2021.
- Huang Tsung-Huei. *Animals as Mirrors*. Taipei: Chi-Dung Wen Hua, 2018.
- Huang Tsung-Chieh. *Taxiang Hechu: Dongwu · Chengshi Yu Wenxue*. Taipei: New Sharing Culture Enterprise Co., Ltd., 2017.
- Liu Ka-Shiang: *Hill of Stray Dogs*. Taipei: Yuan-Liou Publishing Co.,Ltd., 2016.
- Liu Ka-Shiang: *Fu Tei Cats*. Taipei: Yuan-Liou Publishing Co.,Ltd., 2016.
- Wang Chih-Hung, Kao Yu-Ting. "The Animal Folding of Urban Territorialization: The Texture of Human-animal Relationship in Open Space,"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Research*, 67, 2017.11, pp.1-32.
- Huang Tsung-Chieh. "The Concept of Nature in Liu Ka-shiang's Animal Fictions," *Dong Hw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10, 2009.12, pp.285-324.
- Huang Tsung-Chieh. "Looking for a Road on the Move: On Dialogue and Imagination of the Environmental Consciousness in Ka-shiang Liu's Hong Kong Writing," *Dong Hw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25, 2017.6, pp.203-228.
- Huang Tsung-Huei. "Animal Advocacy in Ka-Shiang Liu's Hill of Stray Dogs: Jacques Derrida's Animal Concern as a Point of Departure," *Chung Wai Literary Quarterly*, 37(1), 2008.3, pp.81-115.

**Remains of The City:
The Geographic Space and Life Concern
in Ka-Shiang Liu's *Hill of Stray Dogs* and *Fu Tei Cats***

Mu-Ching Chen*

Abstract

In Ka-Shiang Liu's *Hill of Stray Dogs* and *Fu Tei Cats*, the discussions mainly focus on the behaviors and habits of stray dogs and street cats in Taipei and Hong Kong respectively. Although dogs and cats are different species, they have a common identity, that is "the remains of the city", it means they are all abandoned animals by human. Because of this status, those which are seen as the breaker of order and landscape of the city are often driven away, trapped and caught, and this is the motivation of author's writing and recording.

Regarding the Chinese definition of "Yu"(餘), there are many implications that rely on the context. In this article, we will discuss the Geographic Space and Life Concern in Ka-Shiang Liu's works to realize the life dilemmas of animals. About the former, the stray dogs and street cats live in the edge of the city, but the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the pursuit of the development will cause their life crisis. As to the latter, the author concerns that these animals will lose their subjectivity and be disabled if depending on human deeply. But, as a matter of fact, they also have agency to create a new life after being abandoned or captured. All in all, Ka-Shiang Liu wants to prompt everyone to rethink the ethic and interaction lines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animals by writing these works, and promote the rights, protection and respect for animals.

Keywords: Ka-Shiang Liu, *Hill of Stray Dogs*, *Fu Tei Cats*, Remains, City

* Postdoctoral Fellow,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Tunghai University